

四川歷史研究文集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K297.1
29

四川历史研究文集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贾大泉 主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七·十一·成都

封面题签：谢季筠

责任编辑：张 力 吴金钟

封面设计：贾 梅

四川历史研究文集
SICHUAN LISHI YANJIU WENJI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成都书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9 字数226千
1987年11月第一版成都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ISBN7—80524—028—0/K·7

(书号：11316·77)定价：1.80元

前 言

四川，同我们祖国的其它省区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发祥地之一。继1951年资阳县黄鳊溪发现“资阳人”，证明旧石器时代就有“新人”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旧石器时代的远古文明后，1986年10月下旬，三峡地区古生物考察队又在巫山县龙坪村龙骨坡一处洞穴堆积里，发现了一枚一百八十万年前古人类的右侧门齿，并在同一层位还获得了一段带有两齿的下颌骨（见《光明日报》1986年11月30日第一版），证明早在一百八十万年以前四川境内就有了人类的活动。巫山县古人类门齿的发现，不仅反映了四川是我国也是世界上古人类的家乡之一，而且为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提供了新的依据。

历代四川人民，在美丽富饶的巴山蜀水，前仆后继，辛勤耕耘，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创造了“天府之国”的历史文明。在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人才辈出，群英荟萃，一度出现过高度繁荣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为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为大西南和四川的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四川人民的骄傲，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四川悠久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吸引了历代学者对四川历史进行研究和探索，并写出了不少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四川史学界对四川历史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1978年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建立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研究所的同志，从1980年起就确定以研究四川地方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并争取在1990年前后完成多卷本《四川通史》的编写工作。在搜集、整理和编写《四川通史》素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要编写出一部思想体系正确、内容丰富完整、结构谨严而又具有独创风格的《四川通史》，仅仅吸收、利用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是远远不够的。四川历史研究上的许多空白尚需填补，四川历史上的许多问题尚需进行认真的、深入的探索。为了完成编写《四川通史》的艰巨任务，我们决定用几年时间，首先从事四川历史的基础性研究工作，集中力量进行四川断代史、专史和某些专题的研究。按照这个设想，几年来我们已经完成并出版了《成汉史略》、《前蜀后蜀史》、《宋代四川经济述论》、《蒙古定蜀史稿》、《余玠传》、《四川近代史》（与川大合作）、《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四川军阀混战》、《辛亥革命四川三大将军传》、《四川简史》、《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康藏大事纪年》等学术专著和成百篇有关四川历史的学术论文，为编写《四川通史》打下初步基础。

这本文集收录的文章，就是我所同志在1986年为研究四川史所撰写的部分学术论文。因此，它自然不是我所同志全部最为得意之作，加之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这就难免有疏漏甚至错误之处。我们把这些研究成果公开出版，目的在于求得研究四川史的同仁们的批评指教，以便能集思广益之效，为日后编写《四川通史》，利用这些研究成果时予以补充和修正。

这本文集在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领导和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同志的大力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

贾大泉 1986年12月10日

目 录

前 言	贾大泉 (1)
蜀枸酱, 蜀布, 邛竹杖考辨	任乃强 (1)
试论宗姬巴国与廩君蛮夷的关系	段 渝 (19)
“禹生石纽”辨析	周原孙 (36)
论《史记》与《华阳国志》的关系	赵 毅 (53)
诸葛亮与鲁肃	杨伟立 (67)
四川在宋代的地位	贾大泉 (81)
忽必烈征滇过蜀路线考辨	陈世松 (99)
论大西军镇压四川官僚地主武装叛乱	王 纲 (117)
清代四川的仓政与民食问题	鲁子健 (133)
“清官”张鹏翮简论	赖涪林 (148)
论清代的贍对问题	任新建 (158)
清代前期四川商业贸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林 顿 (179)
再论四川义和团运动及其它 ——兼及义和团运动的范畴	张 力 (194)
试论哥老会在四川人民反清、反帝斗争中的 地位和作用	王家楼 (210)
“成都兵变”不是赵尔丰策动的	马宣伟 (223)
张国焘的“左”倾和右倾错误对川陕革命根 据地的危害	温贤美 李文义 (235)
英国侵藏浅析	张云侠 (255)
台湾吕实强先生研究四川近代史情况简介	王 炎 (269)

蜀枸酱，蜀布，邛竹杖考辨

任 乃 强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出使南越，食蜀枸酱，问其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唐蒙从这一线索，料定巴蜀有条商道通夜郎国，从夜郎浮船牂柯江（今西江），可以直取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遂上书劝汉武帝发巴蜀兵与夜郎合兵攻取南越，而为武帝采纳。

无独有偶，“元狩元年（前122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今阿富汗）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今印度），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张骞据此谏汉武帝重开西南夷，以巴蜀求道通身毒。汉武帝于是派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①

这样，由于蜀枸酱、蜀布、邛竹杖这三种四川的土产在异域的发现，激起了汉王朝向广大西南地区开拓疆土的劲头。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过前后三十来年的努力之后，虽未达到打通身毒道的目的，却使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夜郎、滇、且兰、邛、笮、斯榆、冉駹、白马、劳深、靡莫等一百余部归附了汉王朝，设立了犍为、牂柯、越西、益州、武都、沈黎、

汶山七郡，对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故司马迁说：“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后揃，剽分二方，卒为七郡。”②

这三种东西既在历史上起过如此重大作用，自不可不研究一番。但两千多年来，众说纷纭，讹误相传，一直没有搞清楚。六十年代初，我在校注《华阳国志》时曾搜罗有关这三种东西的资料百余条，发现歧异之处甚多。今乃翻检旧稿，参考诸书，略作考辨，以抒管见。

一、枸酱、蒟酱辨

枸酱二字，最早见于前面所引《史记·西南夷传》中。此后，班固撰《汉书·西南夷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朱熹撰《通鉴纲目》，郑樵撰《通志》，在记唐蒙故事时，俱仍写作枸酱。但晋代以来的文学家、方志家、医药家和注释史籍者却大都将枸酱写作“蒟酱”，或释枸酱即蒟酱，并把枸酱说成是伴吃槟榔的扶留藤。枸酱即蒟酱，似已成为一种通行的解释。

枸酱真的是蒟酱吗？否。

东汉许慎著《说文》中，枸与蒟是分别归于木部和草部的。其文曰：“枸，枸木也，可为酱。出蜀。从木，句声。”“蒟，果也。从草，句声。”③据此，枸是一种木本植物，当读如苟，入有韵；蒟，是一种草木植物的果实，读如矩，入麌韵。

枸木是一种什么样的树木呢？许慎未作说明，但东汉郑康成的门人刘德，在注《汉书》枸酱时则称：“枸树如桑，其椹长二三寸，味酢。取其实以为酱，美。蜀人以为珍味。”④三国时吴国韦昭作《汉书音义》（据《隋书·经籍志》）注枸酱曰：“枸木

似谷树，其叶如桑叶，用其叶（应为实字）作酱，酢美。蜀人以为珍味。”⑤（谷树，蜀人通常称为构树，中原人称为楮。这种树，叶不与桑同，但果实却是带酸味的，可食。明朱橚《救荒本草》称其为“构桃”。）

上述三种解释略异，但有两点是一致的：一，枸木是一种树，用其果实可以做成一种可口的带酸味的果酱，即枸酱；二，这种果酱是蜀中比较珍贵的特产。

蒟是什么呢？《本草纲目》称：“蒟子，一名土萆茇。苗名萎藤，一名扶留藤。”晋郭义恭云：“蒟子，蔓生依树，子似桑椹，长数寸，色黑，味辛如薑。以盐淹之，下气、消谷。生南安。”⑥（南安，疑是南定或高安之误。据《宋书·州郡志》：三国时为吴武安县，晋平吴，改为南定县，属交趾郡；又分九真郡常乐县，立高安县。二县俱在越南境）。宋宋祁晚年曾官成都，其所作《益部方物略记·蒟酱赞》也说是：“蔓附木生，实若椹纍，或曰浮留，南人谓之，和以为酱，五味告宜。”⑦这就是说蒟即是扶留，以其果实为酱即是蒟酱。那么，扶留是何物呢？

扶留，即胡椒科胡椒属植物蒟叶（又称“蒟子”、“蒟酱”），学名piper betle，原产印度尼西亚，我国南部栽培较广⑧。三国时孙权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出使海南诸国。回来后撰成《扶南异物志》、《外国传》等书，一时引起轰动，从而形成了魏晋以来学人研究海南异物之风。江左士大夫如杨孚、万震、郭义恭、顾征，嵇含、刘歆期等撰写了不少记载南方植物的书籍。对这种胡椒科植物，因译音之别，又有“浮留”、“蒟”

“勃蒟”等名称；同时因它与萆茇（piper lon um）同类相似，故常被人混淆。其实，扶留，蒟都是betle的译音。蒟，即是扶留二字的促读。

扶留与萆茇，都是胡椒科藤蔓植物，都是穗状花序，卵形浆

果，卵圆形叶片，但荦茇叶不似扶留厚，故只采其干浆果用。扶留叶厚如王瓜叶，含芳香油，有辛辣味，“以其叶合石贲灰与槟榔并咀之”，“则滑美，下气消谷。”⑨魏晋以来，江左士大夫多染有岭南人吃槟榔的习惯，故扶留被大量引种到内地。但胡椒科植物喜温暖，荦茇只能产于岭南较热地方，扶留适应性则稍好些，我国南部一些亚热带地区和温暖河谷地带皆宜栽种。四川的长江、金沙江和岷江一些河谷曾引种，⑩但究因气候差异，品种退化，成为“土菱藤”，已不可再用作伴食槟榔之物；到了后来，“蜀人惟取菱叶作酒曲”。⑪

扶留叶拌上蚌蛤灰裹槟榔以食的这种吃法，在我国流传甚广。但扶留叶要新鲜才辛香，干枯后则味淡。由于扶留叶难于保管和运输，因而人们又发现同扶留相近的荦茇子有类似的味道和功效，故将它取代扶留叶。这样，有人又据此将荦茇当作蒟。⑫嵇含《南方草木状》竟以为二者为一物之二形，称：“蒟酱，荦茇也。生于番国者大而紫，谓之荦茇；生于番禺者小而青，谓之蒟焉。可以调食，谓之酱焉”。

上述关于蒟酱之解释，虽然含混不清，但有两点是明确的：一，蒟酱是用胡椒科藤蔓植物扶留或荦茇的叶和花实所制的调味品，是作为与槟榔并食的食品。二，它原为岭南特产，并非自蜀中“流味”而来。

由此可知，枸酱与蒟酱从植物分类学来看，是用两种根本不同的植物所制。无论是味道、功效、食法、产地都不相同，不应当作一物。而且，从上引资料可知，晋以前人和晋以后人对蜀枸酱之解释各不相同。是故，晋代为指枸为蒟的发端。稽诸史籍，造成这一误解的起因，乃是刘逵为左思《蜀都赋》所作的一段注文。

刘逵，又名刘渊林，济南人，与左思同时代人。左思作《三都赋》，苦于对蜀中情形不甚了解，多求助于熟谙蜀地风物的

张载。但张载后来仅注释了《魏都赋》。其余的《吴都赋》、《蜀都赋》俱由刘逵注释。刘逵生平无考，但从他的注文看，他对江南风物、掌故较熟悉，对蜀中事物则较陌生，许多注释都是取于传闻或他人笔记。刘逵在采用这些资料时，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剪裁失误，往往错谬，甚至以讹传讹。作为倜傥不羁的文士，当然我们不好用史家的标准去苛求于他。但他对蒟酱即枸酱的一段注文，竟把后来诸多学者引入迷途，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了。

《蜀都赋》：“其圃则有蒟蒻、茱萸……”句下，刘逵注道：“蒟，蒟酱也。缘树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时正青，长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辛香，温调五脏。蒻，草也。其根名蒻头，大者如斗，其肌正白，以灰汁煮则凝成，可以苦酒腌之，蜀人珍焉。”然后，刘逵又在“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枸酱流味于番禺之乡”句下注曰：“《南越传》曰：‘使唐蒙讽晓南越。食蒙以蒟酱，蒙问所从来，答曰：西北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故《汉书》曰：‘感蒟酱、竹杖，则开牂牁、越西也。’”^⑬很明显，为了和蒻相对应，《汉书》所记的枸酱便被他改成蒟酱。

那么，刘逵所描述的蒟酱形态所据何来呢？由前述刘德枸酱注和郭义恭《广志》所记蒻子两段文字，可知，刘逵是将刘、郭二人所说拼凑而成蒟酱之注的。他将刘德“枸树子如桑椹，长二三寸”文，套入郭义恭关于蒻的形态描述中，写成上述一段注释，自然是非常牵强的。何况他将蒻蒻释成蒟酱、蒻头两种东西，就更大错而特错了。左思在《蜀都赋》中所说的园中栽培植物蒻蒻，即《华阳国志》所记之“芳蒻”。它是天南星科草本植物，又名蛇六谷，俗称魔芋。李时珍《本草纲目》称：“蒻蒻，一名蒻头，一名鬼芋。出蜀中。施州亦有之，呼为鬼头。闽中人亦种之。……秋后采根，……以酹灰汁煮，……即成冻子。切片，以

苦酒五味腌食。”蒟是什么呢？《说文》曰：“蒟，蒲子，可以为平席，世谓蒲蒟。”

是故，刘逵关于蒟蒻一词的注有三大谬误：其一，以一物为二物；其二，以岭南新引种之物而妄加于巴蜀；其三，因枸、蒟可同音，而改枸为蒟，释蒟为唐蒙所食之蜀枸酱。但奇怪的是，有此三大谬误而历来学人却盲目遵之。这大概要“归功”于颜师古等大学问家的附和吧！

晋末徐广作《史记音义》，集诸家异同之说，遂据刘逵之说曰：“枸，一作‘蒟’，音窆”。⑭窆有二音，一读为矩(jǔ)，一读如楼(lóu)。如前所述，扶留促读为葵(音楼)，蒟即为葵。岭南人故读蒟为葵。因此，徐广音蒟为窆，实是取‘楼’音。但唐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时，因晋灼音蒟为矩，遂误以为窆当读矩之音，故注曰：“窆，求羽反”。⑮这样就为刘逵改枸为蒟找到音义上的依据。

颜师古注《汉书》“枸酱”条时，因袭刘逵之说，认定“蒟”就是“枸”；而魏晋以来关于蒟之描述，与刘德所说的枸树大不相同。于是他武断地说：“刘（德）说非也。子形如桑椹耳。缘木而生，非树也，子又不长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有之。”⑯这样就认定枸酱是扶留藤了。

其后，苏恭撰《唐本草》，更杂取《南方草木状》、《交州记》、《广州记》等晋以来记载南方植物的书籍，把枸酱释为吃槟榔的伴食品了。他说：

“蒟酱，味辛温，无毒。主下气、温中、破痰积。生巴蜀。《蜀都赋》所谓流味于番禺者。蔓生，叶似王瓜而厚大，味辛香，实似桑椹，皮黑肉白。西戎亦时将来，细而辛烈，或谓二种。交州、爱州人云：‘蒟酱，人家多种，蔓生，子长大，谓苗为浮留藤；取叶合槟榔食之，辛而香也。又有葶苈，丛生，子细，味辛于蒟

酱。此当信也。”

照他说来这种伴食槟榔的蒟酱，是原生于蜀地，后来被交州、爱州人引种的了。

宋代苏颂作《图经本草》时，感到把热带植物扶留说成是史书上明载“独蜀出”的枸酱，于理难通，于是搞出个“调停古今之说”，曰：“蒟酱，生巴蜀，今夔州、岭南皆有之。……刘渊林注《蜀都赋》云：‘蒟酱缘木而生，……’今云蔓生，叶似王瓜而厚大，实皮黑肉白；其苗为浮留藤，取叶合槟榔食之，辛而香也。两说大同小异。然则渊林所云乃蜀中如此，今说是海南所传耳。今惟贵革拨而不尚蒟酱，故鲜有用者。”^{①7}因为很难自圆其说，他只能含糊地解释说，蜀中的蒟酱和岭南的蒟酱因地方不同，故说法略异。显然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到了清代，小学大师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仍囿于成说，作了一段非常牵强的注释。他在许慎：“蒟，果也”一句下注曰：

“《史记》、《汉书》有枸酱。左思《蜀都赋》、常璩《华阳国志》作蒟。《史记》亦或作蒟。据刘逵、顾征、宋祁诸家说，即扶留藤也。叶可用食槟榔，实如桑椹而长，名蒟，可为酱。《巴志》曰：‘蔓有辛蒟’。然则此物藤生，缘木，故作蒟，从草；亦作枸，从木。要必一物也。许君木部有枸字，云可为酱，于草部又有蒟字，盖不能定而两存之……其实名蒟，故云果也。

果，木实。当云：‘蒟果也’，为三字句。”

其实，是他冤枉了许慎。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很明确地将二者分别清楚。《说文》成书于公元120年，距《汉书》之成不过二十多年，加之许慎之博学，所记汉代事物，当然要比刘逵这样后代人的道听途说可靠得多，而且证之汉儒刘德等人的注释，他对枸酱的解释也是有据的。

或云《巴志》既载有“树有荔枝，蔓有辛蒟”，⑮《益部方物略记》也称：“蒟出渝、泸、茂、威等州，即汉唐蒙所得者”。这岂不证明蜀地原有扶留（蒟），它就是《汉书》等所记的蜀枸酱么？

我的看法是：早在汉武帝攻取南越时，槟榔就已引种到中原地区。三国时朱应、康泰出使南洋，促进了岭南对海外的贸易，海南吃槟榔之俗也传入了中原。吃槟榔要用扶留叶，专靠岭南供应则难以满足，故推动长江流域和西南一些亚热带地区引种扶留。滇、黔、川的一些河谷冬无霜雪，可以栽种，故晋时宕渠（渠县）郡、南巴郡、涪陵郡等地都有栽培。颜师古《汉书注》说：“今宕渠有之”，《元和郡县志》也记：“涪州贡蒟酱”，这就是证明。

但是，如果以此证明它就是唐蒙吃到的蜀枸酱，则完全错了。因为扶留原是由亚热带地区向热带地区引种而来，四川省若有，广东省更应当有，《史记》等书却明明白白地说它“独出蜀”，而“流味于番禺”，则乃自蜀而粤。如果粤早已有之，又何须自蜀经夜郎输入呢？再者，吃槟榔乃通俗，扶留叶也算不上什么珍品，蜀人何“以为珍”呢？南越招待汉王朝的使臣，请他吃由蜀商“持窃出市”的枸酱，证明南越也把这种枸酱当成珍品。倘是扶留之类，岭南多有，又何必珍之呢？因此，可以认为，如果晋人所说的蒟酱是扶留一类的话，那么《巴志》等书所说四川产的辛蒟，蒟酱，也是伴食槟榔之物，并非汉代流味于南粤之枸酱。四川古有吃槟榔之俗吗？回答是肯定的。直至六十余年前，四川许多饮食馆的桌上都还间置槟榔一碟，任顾客取食，就像北方饭馆桌上放有大蒜一样。那时四川民间流传“饱吃槟榔，饿吃烟”这句话。但我却从未见过合扶留叶吃的，因为此时四川的扶留藤，早已退化为“土菱藤”了。

那么，唐蒙所食的蜀枸酱究竟为何物呢？

明杨升庵依刘逵说，附会为魔芋所制的“黑豆腐”。①⑨这显然是不对的。刘逵是将蒟蒻一物说成为二物。杨慎则是将枸酱与蒟蒻二者合而为一物了。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枸酱即枳椇酱。《诗·小雅》：“南山有枸”，毛氏小序释曰：“枸，枳椇也。”段玉裁解说为：“枳椇，即《礼记》之椇。许(慎)于枸下不言枳椇，椇字亦不录”。②⑩似疑许慎拿不准枸酱之枸，是否即为枳椇。考枳椇即俗称为“拐枣”，“鸡距子”之类落叶乔木，属鼠李科，叶广卵形，边缘有锯齿，似桑叶，花序呈聚伞状，分枝扭曲。它的果实呈球形，青时味酸，熟时果肉呈棕红色，味甜，供食用，可以用以酿酒，或作成果酱，味甘美，故亦被称为木蜜，树饴②⑪，今我国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均有出产。但它原本为南方植物。三国时吴人陆玕的《毛诗草木虫鱼疏》就说它“本从南方来”，“江南特美”。《齐民要术》引《广志》说，枳椇出南方，“邳郯(今江苏地)枳椇大如指。”然则枳椇非蜀之特产，说为“独蜀出”的枸酱亦不通。如果非要说它就是唐蒙所食之蜀枸酱的话，那么只能这样解释：由于蜀与夜郎近，且当时有商旅相通，夜郎闭塞，只知蜀有此物，不知他处亦有，才有“独蜀出”之说。番禺一带不产此物，故由夜郎输入，以为珍品。是否如此，待考。

除此之外，我认为尚有一物似为唐蒙所食之枸酱，那就是枸杞。枸杞，一名枸橼，属茄科，落叶小灌木，其浆果亦成卵圆形，生青熟红，味甘美。它原是温带野生植物，后陕、甘、宁、冀、川、粤等地都有栽种。因为其一身都是宝(嫩茎、叶可作蔬菜，根可入药，实为补肾益精，养肝明目的补药)，故在中原地区几被采伐殆尽，只甘凉，川蜀等“边隅”，还保留较多，于是才开始栽培。秦汉时，中原地区栽培尚少，野生枸杞又多被采伐净尽。巴蜀其时人稀地旷，出产此物较多，制以成酱，作为一种保健食品。因被人偷偷拿到夜郎出售，才流味于番禺，故亚热带

的广东地方，后来也开始种起枸杞来了。

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断，其依据是：一，唐蒙在未到南越前必吃过或见过蜀枸酱。否则怎能在南越辨知他所吃的就是蜀枸酱呢！这说明蜀枸酱作为一种珍贵食品早已行销或贡献到京师（长安）一带地方了。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如夜郎等部，素乏甜食。枸杞甘甜，粒粒如红珠，是当地少数民族喜爱之物，故向蜀人购取，并沿牂柯江流到南越。这就像过去尽管交通不便，西藏上层人家却总爱从新疆购入葡萄干，作为一种高级食品一样。三，枸杞具较强的滋补性，南粤人素尚滋补，故由夜郎输入。

或问：枸杞今多以子粒食之，有用此作酱的吗？回答是肯定的。清以前有部叫《养生杂纂》的书，记有枸杞酱的作法：“采枸杞子红熟者，去蒂，水洗净，沥干，砂盆内烂研，以细布袋盛，滤去滓，澄清一宿，去清水；若天气稍暖，更不待经宿。入银、石器中，慢火熬成膏，不住手搅之；勿黏底。候稀稠得所，泻向新瓷瓶中盛之，蜡纸封，勿令透气。每日早朝温酒下二大匙。夜卧再服。百日，身轻气壮，耳目聪明，须发乌黑。”^{②②}是否这就是汉时蜀枸酱的制法，已不可知，仅作为一条线索，记此以备研究者参考。

二、蜀布考

张骞在大夏见到的蜀布为何？历来尚少有人考释。“布”，如果单从字面解释，可有二释：一是货币，二是衣料。

当秦汉之时，曾称钱为‘布’。《周礼注》曰“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故汉以来人们把流通用的货币称为“布”。汉王朝的通行货币，不得称为“蜀布”。因此，张骞所

见到的“蜀布”，不是铜钱，而是蜀中所产的一种布匹。

秦汉时我国尚无棉花，当然无棉布。那时用作衣料的乃是丝织品（绢、帛），毛织品（褐），麻织品（布）等。《吕氏春秋》记“戎人见暴布者，问何以为此莽莽也。指麻而示之”。证明当时称为“布”的衣料是麻所织造。麻有多种，古时用作织布者，主要是大麻和苧麻等纤维较柔细的麻。汉时中原地区无苧麻，用以织布者只能是大麻。故《说文》曰：“布，枲织也。”枲，就是大麻。

大麻俗称火麻，雌雄异株，雄株称为“枲”，又叫做牡麻；雌株称“苴”或“子麻”，俗称“母麻”。前者主要用其韧皮纤维织麻布；后者主要用以收子（即中药之“火麻仁”）可榨油。苴麻之实古称为“𦉰”，其韧皮虽亦可沤绩，但麓短不堪作“经”（细麻布），只能作粗布或绳索，故称其为“纆”，与经字为对偶字。故《尔雅》曰：“𦉰，枲实。枲，麻。苧，麻母”。孙炎曰：“𦉰，麻子。纆，苴麻盛子者。”崔寔曰：“苴麻，麻之有蘊者，苧麻是也。一名𦉰。”②④《说文》曰：“经，细布也。纆，𦉰属，细者为经，粗者为纆”。“𦉰，枲属。”这些都证明，古代黄河流域织布之麻乃是大麻。

三国时陆玕作《诗经草木虫鱼疏》，把《诗·陈风》：“东门之池，可以沤纆”的纆字解为苧麻，是把纆与苧搞混了。他说：“纆，亦麻也。……荆扬之间一岁三收，今官园种之。岁再割。便生剥之，以铁若竹刮其表，厚皮自脱；但得其里如筋者，煮之，用缉。谓之‘微苧’。今南越纆布皆用此麻。”这明明说的是苧麻，故无怪自唐孔颖达作注疏以来，解经家都遵此说，不敢立异。其实陆玕作为吴人，习见长江流域所产苧麻，遂以苧、纆同音之故，以为中原地区作纆的麻也是苧麻。后来之人迷信其说，有更将《尔雅》和《四民月令》中的“苧麻”也改作“苧麻”，来为陆疏作证的。